

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百年文学与
传统文化

罗成琰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百年文学与
传统文化

罗成琰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 / 罗成琰著.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百年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I . 百 ... II . 罗 ... III .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 I206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097 号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

罗成琰 著

责任编辑：符本清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10.625 字数：274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5355-3800-2/G · 3795
定 价：19.5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必然包含着价值判断，文学家的赞赏与贬抑、肯定与否定都或明或隐地体现在作品的各要素中，形成文本的召唤结构，引导读者从审美活动中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于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价值判断与选择在作品中的体现尤其鲜明重要，因而20世纪中国文学评论相对而言比较重视从人生意义与价值选择的角度来评判作品。不过，由于时代本身的限制，以往的文学批评在价值问题的分析方面有两点局限是明显存在的：一、从严格的学科领域分界来看，价值观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同一般性的人生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以前的文学批评习惯于将二者混同起来有时甚至将价值学说完全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从而遮蔽了价值观念作为伦理学说的特殊性；二、在文明社会中，价值观呈多元形态，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有阶级意识形态的，也有以共同人性为基础的。以前的文学批评对价值观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方面，而对其他一些类型的价值体系则有所忽略。

最近，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几位教授承担

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各种价值观念的爬梳整理与分析剖解,突出价值观念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独特性关系,显示出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具有的独特影响。一方面,为文学与价值观的密切关系确立一个历史性的依据,让人们从理论与历史中认识到,在文学中价值可以被重估、被解构,但是不可以也不可能被驱逐;另一方面,这一课题的研究也说明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主导性的价值体系,这种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同其他各种价值体系之间既有区别,也有相通之处。这种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如何包容并且充分利用各种价值体系来促进社会文明的多元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正是出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问题之关注,当课题组成员前来联系这套丛书出版事宜时,我们欣然答应下来,并初步拟定人文主义、传统文化、宗教伦理、市民文化、后现代主义等价值体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体现,作为这套丛书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来告诉人们,如果文学的领地只允许一种价值体系的存在,文学就无可置疑地会变得单调、枯燥与板滞,同样,在多元格局的价值形态中,文学家如果不能明确自己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文学也就难以完成它的人类文明建设的责任担承。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套丛书,我们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成果在编辑体例上作出了统一的要求,但在学术观点与写作风格上,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给作者一个自由与充分发挥学术个性的空间。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够较好地实现我们的出版构想与目的,并热切期盼着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2002年10月



作者简介

罗成琰，1957年出生，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湖南省文学学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联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主要著作有：《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1992）、《回溯长河之源》（1995）、《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1999）、《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罗成琰卷》（2000）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曾先后独立承担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二项，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一项。曾获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二、三等奖。

目 录

出版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儒家文化价值观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13)
第一节 承担道义的千秋情怀	(16)
第二节 修身养性的自我完善	(31)
第三节 血缘认同的家庭伦理	(47)
第四节 利群贵和的群体观念	(67)
第三章 道家文化价值观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86)
第一节 超世孤傲的叛逆精神	(87)
第二节 对抗异化的自然人性	(103)
第三节 清高淡远的生命情调	(122)
第四节 寄情山水的自然意识	(145)
第四章 佛教文化价值观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164)
第一节 一切皆苦的人生观念	(166)
第二节 任运随缘的处世态度	(187)
第三节 自性清净的至善本质	(205)

第四节	自度度人的拯救情怀	(224)
第五章	侠文化价值观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252)
第一节	潜行隐构的民间形态	(252)
第二节	慷慨激昂的英雄传奇	(264)
第三节	世俗风尘的侠义情怀	(280)
第四节	快意惬意的化外世界	(298)
附录	现代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	(312)
参考书目		(329)
后记		(333)

第一章

绪 论

传统文化价值观在 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富于戏剧性的命运。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价值观遭遇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强有力地挑战。在西方一整套完全不同形态的价值观、知识体系、文化理念面前，中国传统价值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震荡。人们对知识、经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

个人的社会成就等等的价值判断，都渐渐脱离传统价值体系的紧密控制，从而相当程度地松动了信仰、知识、规范、制度之间的整合关系，降低了传统价值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规范能力。辛亥革命后，传统文化价值观由于突然失去了强有力的政权支持和行政贯彻渠道，它已经丧失了原来作为社会价值的神圣性，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义、伦理道德法则也失去了往日的威慑力。因此，辛亥革命在造成政治权威丧失的同时，也连带造成了社会价值权威的空阙。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文化价值观逐渐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退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运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运用现代人所拥有的理性和怀疑精神，去重新审视和评判中国传统文化，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①。正是这种价值重估，导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的出现，标志着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正式遭到放逐，从中心退向边缘，也预示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尝试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批判与颠覆，主要是针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统摄中国人意识形态数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其锋芒所向直指以孔子为精神权威和价值取向的儒家文化经典。孔子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偶像，在历史上并非没有经历过思想挑战，但此时第一次被描述为妖魔鬼怪，第一次遭到毁灭性打击。陈独秀等人有意对孔子采取整体打倒、一概否定的激烈姿态，有意回避详实平允的学术研讨，有意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高度对儒家文化价值观进行穷追猛打。孔子因为倡导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 第1号。

而在过去独享尊荣，而现在却因为同样的原因交上了厄运。作为儒家传统维护者的梁漱溟在当时便惊呼：“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① 的确，同样作为传统文化价值观有机组成部分的道家、佛教和侠文化价值观在当时却没有像儒家那样面临着灭顶之灾。它们或是作为传统文化的非主流部分甚至异端部分，成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反儒反孔的思想武器；或是用来附会西方的某种思想学说或被进行了现代阐释和现代包装；或是在王纲解纽、天崩地裂的时代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和灵魂的家园；或是以潜行隐构的形态在民间悄然生存悄然生长。这样，从 20 世纪初开始，儒家学说几乎成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代名词而一直受到压抑和抨击，在文学中也很少获得正面的表现，相反，“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则成为贯穿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话题。而道家、佛教和侠文化价值观则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在文学中也得到了一定的肯定和表现。

一直到 20 世纪末，传统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儒家文化价值观才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潜行状态，重新浮出了历史的水面。80 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价值认同态度，其代表作家认为离开传统文化就无所谓中国特色，也无所谓中国文学的艺术个性，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应从民族的总体文化前景中孕育出来。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的态度表示了不满，甚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源流的断裂。因此，他们在作品中着重发掘和表现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及其东方文化的审美和思维优势。在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

这之后，“国学热”的兴起，使得传统文化不仅在学术界异常活跃，而且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认同和普遍景仰。耐人寻味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启蒙思想家遭到了质疑和冷落，而当时的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却受到了青睐和推崇。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名誉在学术上得到了恢复，在文学创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总体上说，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 20 世纪之末和 20 世纪之初是完全不同的。这时几乎没有作品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激烈攻击的姿态，相反，对传统文化采取亲和态度的作品则是大量的。如《白鹿原》、《曾国藩》、《平凡的世界》、《黄河东流去》、《文化苦旅》、《淹没的辉煌》等等。

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回归，不是时代的倒退，也并非历史的轮回。毕竟时代不同了，社会背景不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也不同了。同样的文化姿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因而也有着不同的历史定位。新文化运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破旧的时代，打破旧文化观念和旧道德是历史赋予那一代人的使命。为了完成这种历史使命而产生的偏激是能够得到理解和承认的。试想，当时如果没有五四知识分子那种战斗激情和反抗意志，没有对传统的批判和对西方的借鉴，将很难出现“打倒孔家店”的壮举，很难出现中国文化的转型和重建。而世纪末则是一个建设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种认为传统罪孽深重，是国人的“原罪”的观点，那种对传统文化价值观持绝对否定的态度，不但在学术的意义上站不住脚，在社会心理的认同方面，也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成为一种最普遍的社会心理，中国人的自我肯定和尊严，必然要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依据，而决不可能用西方文

化来证明自身的独特价值。儒家文化作为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最重要的文化标记。如果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那么，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我角色和认同感在什么基础上能够建立起来呢？

同时，回归传统，也不是简单地重返过去，而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带着今天的问题，在对传统进行现代解释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推进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和人文智慧。可以说，回归传统的真正使命在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开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之维。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是过去与现在的不断遭遇、相撞、冲突、融合之中产生的种种可能性或可能世界，是我们所理解的未来。正因为这样，传统在本质上是一个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概念，传统没有封闭的疆域，不是被限定、被凝固的，它永远处于被制作的状态，指向可能的世界。因此，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将是当代中国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化、新的价值学说和新的意义世界所要做的重要工作。

二

不论传统文化价值观在 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怎样富于戏剧性的命运，它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作家的影响却是一直存在的，并且是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它同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学说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价值世界的三维，而且常常同其他两维融合在一起，既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学说的重新观照和改造，又从传统文

化价值观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学说进行选择与诠释。因此，传统文化价值观常常不是以它的原生态，而是以更为复杂甚至变异的形态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作家发生作用。

首先是千秋情怀。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千秋情怀，可极度浓缩为一个“忧”字。无论个人的境遇如何，或穷或达，或微或显，在朝在野，为官为民，他们都关心现实，积极进取，承担道义，忧国、忧民、忧世、忧天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黎民百姓的苦乐，君主社稷的安危，家国天下的兴亡，无时无刻不萦怀于心。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乾坤含疮痍，忧虑何时毕”，从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构成了无数志士仁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也构成了中国文人的一个优良的历史传统。中国的 20 世纪是一个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个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生存空间，更是一个充满着反叛与认同的思想空间。传统文化“兼济天下”的道义取向使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着历史赋予的责任，也自觉实践着自身的文化使命。他们的千秋情怀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能动的忧患意识，20 世纪中国文学绵延着深重的社会政治忧患、思想忧患和文化忧患，它们纵横交织、层层铺展而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维度。当然，20 世纪中国作家的千秋情怀不仅来自传统，它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一观念的影响，受到了西方现代意识的熏陶，同时也被当时中国时代环境和现实政治所强化。这样，他们的千秋情怀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与古代士大夫们大不

相同。君主社稷的安危，已被国家民族的兴亡所超越；仕途经济的追求，已被人格独立、人性解放所超越；古代民本主义的呼唤，已被近代民主主义所超越。到了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千秋情怀才与西方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空前地接近。不过，20世纪中国作家过多地关注社会政治忧患、思想忧患和文化忧患，而比较缺乏西方那种对宇宙本体、世界本体和人类本体的洞悉与感应，本体忧患的缺乏不能不说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遗憾。此外，古代士大夫对政治的热中和依附的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中国作家，使他们过分认同和追随政治，同政治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和张力，许多作家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精神独立性，审美冲动也往往被政治激情所淹没。

其次是群体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是儒家的“仁”与“礼”，其实质是强调“我”对“他”、个人对宗族、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关系，强调社会和群体的重要性。这种偏重群体，要求个人按照一定的社会与伦理规范行事，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协调，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生价值的核心内容，甚至成为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几千年来群体本位观念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其批判的价值依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文化内部在明清之际已初步显露的个人意识，二是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本位意识。这两个因素相互结合，造就了五四时期声势浩大的张扬个性的社会思潮，个性主题也因此成为当时文学中的重大主题模式，并时断时续地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但是，当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张扬个性，表现自我时，传统文化价值观绝不会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它在知识分子的心理结

构中发生着不为人知的隐秘作用，使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呈现出分裂的状态，一方面，他们崇尚西方的个人话语模式和个性主义思潮，对自我的情绪、精神、心灵和生命状态格外敏感和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又依恋着群体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特别是在民族国家命运发生着重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眼光很容易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吸引，民族、集体的前途和现状引发了他们的思索，其思维和行为模式极易被传统的群体本位观念所同化，再加上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影响，20世纪中国作家大都经历了由个体走向集体的历史过程，文学中的个性主题也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主题。20世纪末，文学中的集体主义旋律又逐渐弱化，宏大的历史叙事被暂时搁置，个体叙事的声音逐渐兴起，在集体中久被遗失和淡忘的“我”终于再次拥有机会表达自己。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轮回：个体从群体中逃出，又重新融入群体，再回到个体，这从一个侧面构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和心路历程，其中的血与泪、辛酸与欢乐都被永远地载入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

再次是叛逆精神。道家从一开始便是以儒家思想乃至整个社会的对抗者、破坏者的姿态出现的，它对儒家价值虚妄性的指证、对自由的向往、对一切理性权威的反叛以及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问甚至它特有的反社会、反文明的内容一直激动着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文人，也激动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20世纪中国作家在价值观念认同上更多的是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而在情感上则更多的来自道家追求个体自由、反抗封建礼教思想的支持。他们一方面激进地将中国传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批判，

另一方面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道家作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传统的对抗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异端，在道家孤傲超世的精神传统中寻求价值与情感认同。鲁迅在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选择和继承时，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他冷淡孔孟，推崇禹墨，私好老庄韩非，尤其独钟深受老庄思想浸染的魏晋风度。他不仅对魏晋时期的历史和文学有着精深、独特的研究，不仅用“魏晋风度”来概括当时士大夫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方式，而且他的思想性格、人生态度、情感方式等都打上了魏晋风度的印记。可以说，正是魏晋风度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鲁迅一身傲骨，也赋予了他讥讽时世、抨击封建纲常伦理的精神力量。郭沫若从小便读道家的著作，道家文化追求自由的精神成为他放任自我、狂放不羁、脱尘拔俗、孤傲叛逆性格的文化基点，也使他五四时期的创作高扬批判精神，张扬自我个性，追求个体绝对自由，喷发着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激情。道家传统中的叛逆精神在新时期文学中又一次被凸现出来。新时期作家都是从动乱年代中走过来的，他们在动乱年代中深深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对人的压制以及动荡岁月中个体生存的极度不确定性。他们将反思的目光再一次投向个体生存的意义。阿城的《棋王》便是这一反思的成果。其反思的武器正是道家追求个体生存价值、向往精神自由、孤傲超世的叛逆精神。

最后是生命情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和禅宗非常讲究清高淡远的生命情调，不仅追求一种自然适意、富于艺术意味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表现出一种超然洒脱、和谐旷达的人生态度，达到超利害、泯物我，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状态。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即在于“一种以艺术眼光对待人生的天赋才